

HOW THE EAST ASIAN
ECONOMY GOT DISEMBEDDED

“脱嵌” 是如何发生的

东亚模式的转型

王永钦／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REPORTING FROM ASIAN
ECONOMIST'S HOT SPOTS

“脱嵌”

是如何发生的

陈冠中 著

陈冠中 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 PRESS

HOW THE EAST ASIAN
ECONOMY GOT DISEMBEDDED

“脱嵌” 是如何发生的

东 亚 模 式 的 转 型

王永钦／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脱嵌”是如何发生的:东亚模式的转型 / 王永钦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5097 - 6574 - 6

I. ①脱… II. ①王… III. ①区域经济发展 - 研究 - 东亚 IV. ①F13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9223 号

“脱嵌”是如何发生的

——东亚模式的转型

著 者 / 王永钦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宋 超 郭 烁 于 冲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9.4 字 数: 164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574 - 6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001
一 为什么要研究东亚模式	001
二 本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006
三 本书的主要发现	008
四 本书的结构安排	013
第二章 东亚模式: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	014
一 作为后进国家成功赶超范例的东亚模式	014
二 东亚模式的特征	016
三 历史比较视野下的东亚模式	031
第三章 嵌入性、自主性与发展模式:一个分类学	033
一 引言:经济发展之谜	033
二 嵌入性、自主性与发展模式:一个理论框架	036
三 经济发展模式的四个世界	041
第四章 嵌入型体制的经济是如何发展的: 一个基于东亚模式的理论框架	048
一 引言:什么是东亚模式	048

二	嵌入型体制的经济发展： 作为互联关系型合约的产业政策	054
三	法律、社会规范与经济发展	063
第五章	东亚模式是如何脱嵌的	066
一	从有限进入秩序到开放进入秩序	067
二	从基于投资的增长到基于创新的增长	087
三	东亚模式的启示	097
第六章	重启改革议程： 东亚模式视角下的中国奇迹及未来	105
一	嵌入型体制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106
二	竞争性的嵌入型体制：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	118
三	中国地区竞争性嵌入型体制的代价： 一个理论分析	121
四	中国竞争性嵌入型体制的代价	125
五	重启新的改革议程	144
参考文献		150
附 录		160
	脱嵌问题是社会转型问题	郭定平 / 161
	要注意研究“入嵌”与“脱嵌”的环境	陈建安 / 165
	从干预向市场模式转型的条件	马 骏 / 168
	中国与东亚国家社会转型的差别	韦 森 / 172
	中国和东亚模式是截然相悖的两条路	方 钦 / 174
	“入嵌”易，“脱嵌”难	秦 晓 / 176
	嵌入性经济的概念值得商榷	章 奇 / 179
后 记		182

第一章 导论

一 为什么要研究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赶超的典范。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当时都是相当落后的农业经济，其人均 GDP 与当时的肯尼亚相当。但在短短的 40 年时间内，它们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赶超奇迹，而且顺利实现了政治的民主化转型，成功地走上了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的稳态社会轨道。“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成为二战后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是发展中世界实现经济赶超并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成功案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要么陷入了贫困陷阱（如大部分非洲国家），要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和南亚国家）而不能自拔。

反思东亚模式对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具有很强的学理意义。虽然人类的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核心的问题。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和经济与社会的互动，是理解发展过程的关键所在。政府是否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干预，是经济学中最具有争议的话题之一。而其中的产业政策，即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对经济活动进行的干预，是一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有重要意义也富有争议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和转型经济而

言，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例证是，在最近的几年内，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对一度被冷落的产业政策的研究兴趣又重新燃起。对产业政策的新的一轮研究热情可能与下面的几点背景有关。一方面，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过去 30 年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自由化政策（被称为“华盛顿共识”）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而是带来了经济停滞，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的试验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失败，亦从反面说明了国家的干预不能无所不包。而东亚经济的实践则介于两者之间，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被很多人认为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

历史地看，东亚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尤其是韩国）在经济起飞和赶超阶段都实施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它们的产业政策具有以下特征：（1）实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扶持本国或本地区的大工业企业；（2）扶持具有很强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的支柱产业；（3）银行向企业提供长期融资支持的政策性贷款，同时还在财政上提供各种显性或者隐性的补贴；（4）政府还积极创造条件，为大企业集团的产品提供市场（如日本的综合商社）。上述（1）和（3）这种故意将价格做错（getting price wrong）的产业政策，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Johnson, 1982; Amsden, 1989）。

现在，理论界和政策界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更趋客观。重要的问题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whether），而是“怎样干预”（how）。然而，尽管如此，产业政策却在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地区惨遭失败。例如，二战后很多拉美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并没有带来经济发展，这促使我们思考政府与市场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研究东亚模式，不仅对理解经济发展，而且对理解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无疑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东亚模式不仅是经济发展的

典范，也是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典范。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后，比较平稳地实现了民主化的政治转型，成功地进入了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为标志的现代稳态社会，成为二战后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的奇迹。而放眼发展中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落后，而且政治很不稳定，缺乏维持基本社会秩序的政府，政府被利益集团所俘虏，成为掠夺性国家（predatory state）。经济发展与政治结构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市场和经济组织是如何从社会政治结构中脱嵌出来的？市场化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政治精英和民众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本书着眼于东亚模式的目的，即在于从理论和历史结合的角度刻画这种市场和经济组织从社会政治结构中脱嵌的过程，旨在为东亚模式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框架。

除了一般性的学理意义外，研究东亚模式还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具有非常直接的现实意义。中国与东亚相比具有很多共性，比如先经济发展后政治变革、威权主义政府、审慎的自由化次序等等。但两者之间也存在很大区别。如：中国政府掌握的资源和经济的支配力都远远超过东亚政府；东亚模式发展之初就进行了平等主义的土地改革，从而为共享式增长和政治转型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而中国并没有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高度的不平等。尽管如此，东亚地区在文化、历史背景方面与中国大陆存在很大相似性，尤其是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还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研究东亚模式对探寻中国转型的途径和路向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反思二战后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潮，在理论界和政策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以IMF和世界银行为主的国际组织，在20世纪后期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政策就是自由化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即所谓“华盛顿共识”（以“市场化”“私有化”和“稳定化”为三个支柱）。该主张秉承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经济

成功转型与繁荣的关键在于充分引入市场机制，消除政府造成的各种扭曲，“将价格做对”（getting prices right），但是这种改革却遭到了普遍的失败。公正地说，“华盛顿共识”作为一个最终的经济发展的状态和方向，其实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将其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政策处方，则错将目的当作手段。的确，作为一种政策处方，“华盛顿共识”无论是对于转型经济还是对于发展中经济，都惨遭失败。对于转型经济来说，在19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经济在“休克疗法”的思维下，几乎一夜之间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对国有资产和资源配置机制进行了巨大的变革。与“休克疗法”的支持者设想的相反，“休克疗法”在转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带来苏东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反而使这些地区的经济陷入了长期的衰退，而采取渐进改革方案的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目前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样，“华盛顿共识”在其他发展中经济中也遭遇了滑铁卢。“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们认为，发展中经济要发展，就必须首先进行大的制度变革，改变政治结构和产权结构，这也是很多强调制度重要性的经济学家所推崇的（North, 1990; Acemoglu, 2005），但是，他们都忽略了制度结构的内生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适宜的制度”可能是市场发育程度所内生决定的（Arrow, 1971）。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发达的国家都是相似的，而不发达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发达之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育情况各有不同，这意味着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可能需要不同的制度结构。这也是本书反复强调的主题之一。

具体地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东亚奇迹的出现，国际上就开始有一些学者研究东亚模式。尽管文献浩如烟海，但其关于东亚奇迹的解释，总的来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东亚奇迹的出现，是发展型政府积极干预的结果。美国学者Johnson（1982）在其《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提出发展

型国家的理论来解释日本的经济奇迹。约翰逊教授基于对日本模式化的经济计划官僚机构通产省（MITI）的观察，构建了一个有关干预主义国家的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发展型国家既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被描述为计划-非理性国家，所有权和管理权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如苏联），也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而是计划-理性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plan-ration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兼有私人所有权与国家指导的属性。约翰逊特别强调了产业政策在二战后日本经济赶超中所起的作用。后来罗伯特·韦德提出了“驾驭市场”（governing the markets）的类似框架，来解释二战后台湾地区的经济赶超（Wade, 1990）；Amsden（1989）通过强调后发优势中的“学习效应”来解释韩国的经济赶超。这些文献都强调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东亚奇迹并非政府的功劳，而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因为东亚政府所做的无非是放松规制、对外开放，充分让市场发挥作用而已（如Noland and Pack, 2003）。

在我们看来，这两种观点各执一端，各有其局限性。发展型国家理论过多地强调了政府的作用，而没有充分意识到市场和市场缺失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固然意识到了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大的趋势，但同样没有意识到发展中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市场缺失现象，因而资源的配置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确需要替代性的制度安排。

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东亚模式基础上重新弘扬了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Amsden（1989）与Wade（1990）对韩国、台湾地区的研究，以及Johnson（1982）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奇迹的研究。他们都认为，产业政策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赶超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除了这些具体的国别和地区研究之外，还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对产业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思考（Evans, 2004）。Chang（2002）则从历史的视角对产业政策进行了考察，发现今天标榜自

由贸易的英国和美国在历史的同时期在产业政策的实施方面，要比德国和法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产业政策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更显得重要。很多经济学家对全球化时代产业政策和政府的作用进行了新的探讨，主要的贡献者有 Stiglitz (2002)、Hausman 和 Rodrik (2003) 与 Rodrik (2008)。他们都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美，在全球化时代更应该实施适当的产业政策。在产业政策的实施方面，政府不应该像过去那样来挑选优胜者，而是应该关注过程 (process - targeting) 来纠正市场的缺陷和协调不足，而且产业政策的实施必须针对具体国家的经济结构来实施，因而是因国而异的。

与我们本书中采用的方法最接近的是 Evans 等所代表的经济发展的政治社会学文献 (Evans, 1995)。Evans 提出了“自主性”与“嵌入性”的概念性框架，通过国际比较和案例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产业政策有着不同的遭遇和命运。他认为，好的产业政策应该同时具备“自主性”与“嵌入性”两个条件，所谓“自主性”就是政府是利益中性的，而不是被利益集团所绑架而制定出偏的政策。同时，还必须具有“嵌入性”，即政府和产业之间必须形成某种关系，这样有助于信息的交流和政策的实施。

这个文献对本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在 Evans 这个概念性框架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自主性与嵌入性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从而给 Evans 的框架提供了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不仅如此，我们还发展了一个自主性与嵌入性动态互动的理论，并分析了其对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及政治转型的意义。

二 本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在于理解市场不完全性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将首先在“互联的市场”理论 (Braverman and Stiglitz, 1982; 王永钦, 2006) 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政府在经

济中作用的一般理论。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政府的职能是经济发展的阶段的函数。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分工程度还比较低，市场要么是缺失的，要么是不完美的，经济中主体的交往往往采取互联的合约形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发展中经济的农业市场，佃农和地主不仅在产品市场上发生交易（如佃农可能会购买地主的粮食），在劳动市场上发生交易（如地主购买佃农的劳动），在信贷市场上发生互动（如地主会提供借贷给佃农），还会在保险市场上互动（如地主会向佃农提供某种形式的保险，如分成租佃就是一种保险）。

同样的逻辑可以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与产业之间。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就类似于一个互联的合约（政府类似于上面的地主）：政府、企业在信贷市场、产品市场等多个市场上存在着互动，通过“交叉补贴”等机制可以实现很多灵活有效的政策工具，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时候，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将相对价格做错（getting the relative prices wrong）的方法可以成功地实现产业赶超，侵占成熟产业的市场，就像日本和韩国的情况说明的那样。

从理论角度来说，东亚模式经济和中国改革开放迄今为止的经济都是一种“嵌入型”经济（embedded economy）。这种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关系（市场与经济组织）是嵌入到现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理论上可以证明，在市场不完备的经济发展阶段，嵌入型经济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在这种经济中，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往往采取了“互联的关系型合约”这种形式。在市场范围较小和分工程度较低（市场缺失）的发展中经济中，两个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会跨越多个“市场”，这被称为“互联的合约”。如上文提及的地主与佃农的例子。由于互联的市场会使得在单一的市场上无利可图的关系合约在互联的情况下变得可行，所以，市场的互联性扩大了可行的关系型合约的可行集合；而在社会分工程度高的经济中，人们在不同的专业化市场（specialized mar-

ket) 上与不同的经济主体进行交易。

除了市场高度不完全外，发展中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另一个重大的结构性区别是，其生产技术远离世界技术前沿。这意味着，它们可以采用现成的技术，因此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动员投资、采用现成的技术。在这种基于投资（investment - based）的发展阶段，嵌入型体制可以实现迅速的经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嵌入型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市场扩展的同时，会使得市场和经济“脱嵌”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市场的日趋完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去伦理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将不可避免。因此，我们将深入剖析东亚模式的嵌入型体制是如何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改变而逐渐动摇并最后瓦解的。

三 本书的主要发现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

在经济发展早期，政府之所以可以发挥更直接的作用，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市场范围较小，社会分工程度低，市场缺失问题还比较严重，政府与企业家（和其他社会群体）的互联性关系型的制度安排（如产业政策）可以弥补市场缺失问题，并促进市场的发育。

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讲，由于自我实施的关系型合约不需要依赖第三方（如法庭）实施的正式制度，所以节省了大量的建章立制的固定成本和交易费用。对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来说，这就是一种“适宜”的制度。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关系型合约的成本就会逐渐凸现：因为它使一个人的边际交易成本（如监督成本）越来越高，而正式制度（基于规则的治理）的边际交易成本则越来越低，即正式制度具有规模经济。

从生产技术的层面来讲，由于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远

离世界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发展中经济可以直接采用现成的技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地组织和动员资源，稳定的关系型合约尤其适合这个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而在市场范围扩展到一定的程度，经济进入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的时候，基于规则的正式制度安排更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促进内生的技术进步。

民主与法治的作用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更有效的治理采取了自我实施的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形式，所以法律的作用在两个方面受到了限制。第一个方面的限制来自它的关系性（relational），即当事人考虑是跨期的和前瞻性的（forward-looking），而法律则往往只能对已经发生的、既往的事情做出判决，是后顾性的（backward-looking）。第二个方面来自它的互联性，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是跨越了好几个“市场”的，而现实中的法律都是关于某一个具体“市场”的争议的，很难将复杂的互联性考虑在内，基于单市场的裁决可能不符合当事人利益的理性考虑，因此他们的理性选择不去法庭。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and 市场足够完备后，法治的作用才会越来越大。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理想情况下，经济发展会通过两种效应来影响交易的互联性和关系性。一是专业化效应，即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分工水平的深化，市场不断专业化，原来需要由互联的关系来实现的交易就可以在专业化市场上进行了。专业化效应会弱化交易的互联性和关系性。二是市场厚度效应，即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分工水平的深化，专业化市场的交易频率和交易量不断提高，即市场逐步变“厚”，这会进一步降低交易双方在市场上的搜寻成本，关系型交易的吸引力就会进一步下降并弱化。通过这两种效应，经济会从人格化的交易为主变化到非人格化的交易为主的阶段。

经济自由化的时机和顺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通常由几个大的财团或者家族垄断，市场结构不是竞争性的。在初期的关系型合约下，这是一种有效的结构。集权的经济体系和一定的进入限

制会有助于稳定的投资，因为关系型合约只有在少数几个固定主体的长期博弈下才可以维持。在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这种稳定的关系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当经济发展到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后，这种垄断性的市场结构会阻挠新企业的进入和技术创新，从而会阻碍长远的经济发展。所以，经济结构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阶段，经历从集权到分权的经济自由化。并且由于市场之间的关联性，顺利推进合理的经济自由化对于转型的成功是很重要的。

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时机：互联的关系型合约是适合经济发展早期的制度安排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需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民主化和法治化，从而为关系型社会向规则型社会的转变奠定制度基础。民主化和法治化往往是和经济上的自由化（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同时进行的。而且，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初始禀赋的平等性，对于巩固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是很关键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工业化之前平等主义的土地改革，为后来共享式的经济发展和巩固的民主转型奠定了关键的社会基础。

理解东亚模式

东亚发展初期，具有自我实施性的互联性关系型合约（无论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还是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维持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弥补了市场缺失。在市场范围比较小的早期，关系型合约是比正式的合约（如民主与法治）更节省交易费用的一种治理结构。这种合约结构还有利于充分动员和组织经济中的资源，适合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但是，当经济发展到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后，这种垄断性的市场结构会阻挠新企业的进入和技术创新，从而会阻碍经济发展。

东亚模式给我们的一般性启示是，政府的作用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起到弥补市场和增进市场发育的作用；在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市场发育比较健全的时候，政府应该退出直接的干预领域，转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且，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应该不失

时机地推进政治转型，使国家走上民主和法治的道路。

理解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

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政府在转型期间控制的社会资源要远甚于东亚模式下的政府，尤其是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但与东亚模式的嵌入型体制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的嵌入型体制是由多个竞争性的地区性嵌入型经济体组成的。这种体制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让中国经济和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产能过剩、收入差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品提供的不足和不公平等等，甚至还造成了全球经济失衡。这与东亚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东亚模式不仅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且实现了共享式的增长。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最终会造成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危机。东亚模式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共享式的经济发展对于成功的政治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而要素市场的改革对于实现共享式增长可以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东亚模式也表明，适时的政治转型和民主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嵌入型体制经济上的代价：扭曲价格信号

在经济层面而言，东亚模式这种嵌入型经济体制本质上是通过互联的关系型合约来配置资源，这实际上是一种“将价格做错”的做法。嵌入型体制通过将价格做错而促进某些产业的快速发展，往往会导致国内市场不能消化过剩产能，东亚经济体通常都会出现产能过剩。在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东亚模式下的产业政策可以模仿发达国家现有的成熟技术来优先发展某些产业，对经济的扭曲也许还处在次优状态（second-best）；但当经济发展到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时，技术水平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没有现成的技术可以直接模仿，这种“将价格做错”的产业政策不仅做不到“次优”状态的资源配置，相对于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下的价格信号，而且会对资源配置产生较大的扭曲效应。特别的，由于这种封闭的体制限制了